

第十八辑

中国诗经学会  
河北师范大学  
◎ 编

# 詩經研究丛刊

责任编辑：战葆红



ISBN 978-7-5077-3567-3



9 787507 735673 >

定价：40.00元

# 诗经研究丛刊

第十八辑

中国诗经学会 编  
河北师范大学

学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诗经研究丛刊. 第 18 辑/中国诗经学会, 河北师范大学编. —  
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 - 7 - 5077 - 3567 - 3

I. ①诗… II. ①中… ②河… III. ①诗经—文学研究—丛  
刊 IV. ①I207. 222 -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1569 号

责任编辑: 战葆红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book001.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)

销售电话: 010 - 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 (邮购)

印 刷 厂: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9.125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00 元

# 目 录

## 世界诗经学

- 欧美各国的诗经研究概说 ..... 张思齐(1)  
欧美诗经论著提要 ..... (香港)张万民(20)

## 百家论坛

- 《诗经》想象艺术论 ..... 吴黎明(57)  
刘勰与钟嵘诗经观之比较 ..... 胡 辉 谢明仁(77)  
西周《大武》乐章新考 ..... 祝秀权(91)  
从诗教传统论《诗经》“风雅正变” ..... (台湾)张鸿恺(104)  
魏晋南北朝“墓志铭”引《诗经》篇名考 ..... (台湾)林登顺(123)  
朱熹对《诗经》二《南》的意见检说 ..... (香港)郑滋斌(142)  
论“孔子删诗”公案的发生 ..... 韩宏韬(166)  
吕祖谦《读诗记》与续《读诗记》的诗经学成就 ..... 黄震云(184)  
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宗毛倾向例说 ..... 杨 延(199)  
戴君恩的诗经观  
——以《读风臆评》为中心 ..... 王霄蛟(204)  
《秦风》十诗作年考 ..... 倪晋波(232)

## 现代学人学著

辨章析句,振本知一

——杨合鸣教授的《诗经》语言学成就…………… 张延成等(246)

评赵沛霖《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》…………… 林祥征(255)

肯把金针度与人

——读刘毓庆《诗义稽考》…………… 王秀珍(263)

## 学术札记

“德音”考论…………… 王振华(270)

《诗经》中的女诗人…………… 方正己(279)

梁山诗话…………… 张步学(285)

## 世界诗经学

### 欧美各国的诗经研究概说

张思齐

#### 一、德国的诗经学研究

德国的《诗经》研究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并且成就非凡的学术领域,它隐含着德国汉学的睿智和才华。英国学者巴瑞特(Thomas H. Barrett)指出,德国的亚洲学科研究,其潜力超过英国10倍,其成就较少为人们所了解,主要是由于语言的障碍。

德国知识界通过拉丁文译本而认识《诗经》,与欧洲各国一样早,始于17世纪初叶。德国知识界通过自己的祖国语言——德语而认识《诗经》,始于18世纪中叶。耶稣会士杜赫德(Jean-Baptiste Du Halde, 1674—1743)所著四卷本《中华帝国全志》是一部大书,该书第二卷收有《诗经》作品八篇。它于1749年翻译成德文出版。德国大文豪歌德正是从此书中获得了对《诗经》的最初印象。

19世纪上半叶,德国出现了优秀的德文全译本《诗经》。弗里德里希·里希特(Friedrich Ruchert, 1788—1866)是第一个将《诗经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。该译本名《诗经·出自孔夫子的中国诗集》(*Schi-King. Das chinesische Liederbuch aus Konfuzius, Altona, 1833*),于1833年在阿尔托纳出版,以后多次再版。里希特不谙中

文,他根据拉丁文本转译。不过,里希特为东方语言教授,又是浪漫派诗人,才华横溢。他十分欣赏中国诗歌的美妙,全力以赴做翻译。因而,这部《诗经》的德文译本,给人以译自原诗的感觉,竟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遥远的德国恢复了“诗三百”的艺术魅力。以此之故,德国人从最初接触《诗经》的时候起,就感受到《诗经》是美轮美奂的,这就激发起后来的许多德国学者为研究《诗经》而奋斗终生。

1844年,约翰·克拉默(Johann Cramer)出版了《诗经》的德文译本。

1844年,噶伯伦茨(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, 1807—1874)出版了《诗经》的另一个德文译本。噶伯伦茨系语言学家和政治家,1847年任魏玛公国国民议会议长,1848—1849年任魏玛公国宰相,著有《满文语法纲要》。他翻译时所依据的《诗经》本子为满文,因而该德文本较多地体现了满族学者研究《诗经》的独特体会。

维克多·斯特劳斯(Viktor von Strau, 1808—1899,中文名:史陶思)是第三个德文本《诗经》的翻译者。书名为《诗经:中国经典式的诗集》(*Schi-King.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, Heidelberg, 1880; Darmstadt: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, 1969*),于1880年在海德堡初版;1969年,德国达姆斯塔特科学出版社将该书再版。此书不仅仅是翻译,而且开启了德国学者研究《诗经》的先河。书的前面有长达60多页的序言,这实际上是一篇大型的专题论文。斯特劳斯对每一首诗都写有丰富的注释,这已经属于文本批评的范畴了。斯特劳斯不仅追求译文精到,还努力使得诗句符合德国的韵味。斯特劳斯的《诗经》译本成了德国文学的宝藏,深受德国读书界的喜爱,至今仍然不断再版。英国传教士、《诗

经》翻译家詹宁斯认为,欧洲最佳的《诗经》译本乃是德国施特劳斯的韵律。詹宁斯自己的《诗经》译本是采用韵译的。并且,这一主张使得一向倾向于散译的英国《诗经》学家理雅各,也在1976年出版了他的《诗经》韵译本。由此可见,德国诗经学对世界诗经学的巨大影响。

日尔曼人是一个讲究精益求精的民族。古罗马帝国解体后一分为三,成为现代意大利、德国和法国的雏形。德国学术界喜爱拉丁文是必然的。

20世纪德国出现了一位天才的诗人、作家兼翻译家弗里茨·米伦维克(Fritz Mühlengweg, 1898—1961)。他在当兵的岁月里,在英国翻译家理雅各《诗经》双语对照本的基础上,实践自己的德文翻译工作。米伦维克曾经到过中国新疆从事过考古,这段经历他后来写成了小说《在穿越戈壁荒漠的秘密使团中》。米伦维克所翻译的《诗经》于1945年以《千年之竹:中国〈诗经〉的意译》(*Tausendj hriger Bambus. Nachdichtungen aus den chinesischen Schi-King*, Hamburg: Dulk, 1945)为标题在汉堡杜尔克出版社出版,受到德语世界公众的热烈欢迎。《千年之竹》初版包含《诗经》中的46首诗,1956年出版了第三次增订版,篇什有所增加。1994年复再版。这些诗章早已超越了翻译的畛域,进入了化境,被公认为是德语诗歌的典范。这样的天才,在人类是不多的。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通过翻译《鲁拜集》而影响了英国一代诗风,米伦维克的译作亦与此相仿佛。当然,这说明《诗经》本身具有世界文明瑰宝的内在品质。

德语国家的《诗经》研究者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,这似乎很少见于其他各国的学者身上,那就是喜欢采用《诗经》里的故事进行文学创作。比如,德国小说家海泽(Paul Heyse, 1830—1914),曾于

19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所创作的小说《兄弟》就是以《国风·邶风·新台》中卫宣公筑新台抢占儿媳妇的故事为本事的。这样的情况也见于奥地利德语作家卡夫卡(Franz Kafka, 1883—1924)的作品之中。

## 二、俄罗斯的诗经学研究

俄罗斯是研究《诗经》的重要国家之一。俄罗斯与中国接壤,拥有漫长的边界线。研究中国以服务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需要,这是俄国和前苏联时期的基本格局。就具体的一个个俄罗斯学者来说,他们未必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,但就其研究的成果而论,毕竟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的。这一基本格局决定了俄罗斯对中国的研究投入较多,因而作为中国研究的一部分的《诗经》研究,也带有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服务的色彩。俄罗斯学者的《诗经》研究,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,或多或少具有浪漫想象的色彩。俄罗斯学者讲究将研究落到实处。从总体来看,俄罗斯的《诗经》研究,虽然起步晚于其他欧洲国家,但是发展迅猛,成果数量多,译作、论著和论文的品质都相当厚重,体系性也比较强。

俄罗斯版图辽阔,横跨欧亚。早在19世纪上半叶,俄罗斯便确定了自己的目标,不仅要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,也要称雄亚洲。因此沙俄政府雄心勃勃,决意确立汉学的学科地位,务求位列世界汉学大国之林。

1852年,《莫斯科人》杂志第一卷发表了《诗经》若干篇的翻译,标题为《孔夫子的诗》,这是最早的《诗经》的俄文翻译,它使得俄国读书界耳目一新。

1855年,西维诺夫(Д. П. Сивилов, 1798—1871)完成了《诗

经》俄文本的翻译工作。西维诺夫是俄罗斯驻北京传道团第十届的修士司祭,也是早期俄罗斯中国学的重要推动者。他还以一人之力,完成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书》和《道德经》俄文本的翻译工作,而且都是全译本。之后不久,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(В. П. Васильев, 1818—1900)译出了《诗经》的第二个俄文译本。由于王西里一直致力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,他的译本质量更高。王西里的译文,最大程度地遵从原意,某些专有名词采用了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,他采用自由体翻译诗歌,他按照内容将三百篇分为婚姻、爱情、讽刺、公务等类别。不过,王西里的《诗经》俄译本一直保存在列宁格勒国家档案馆里,长期未能刊行,对外界影响不大。王西里主要是以《诗经》研究家和教育家而饮誉俄罗斯汉学界的。

1880年王西里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,他撰写了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。该书对《诗经》给予了特别的重视。关于《诗经》的起源,王西里认为《诗经》是远古时期的中国人民在生活和劳作中积累的歌谣。风、雅、颂的语言风格不同,雅诗是儒家学者得到民间歌谣后,仿照它们编写出来的,因而雅诗的语言比风诗和颂诗更为清晰连贯。关于《诗经》的训释,王西里认为其版本经过了汉朝儒学者的篡改。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古今文字的变迁,《诗经》的面目已经与其原始形态有了很大的差别,它是在统治者意志的支配下而流传下来的。关于《诗经》的训释,王西里认为《诗经》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。他反对将《诗经》内容复杂化。他认为《诗经》描写了古人的劳作和生活,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,记录了礼仪制度的变迁。王西里还认为,阐释《诗经》的角度要符合整体性、时代性和逻辑性的要求,不能随意穿凿附会。关于《诗经》之文化价值,王西里肯定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的源头。他将《诗经》与《荷马史诗》

并列。王西里认为《诗经》是中国习俗和礼仪的见证。中国人在思维智慧和艺术才华方面毫不逊色于欧洲民族。今本《诗经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主导,而儒家思想乃是中国人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,因而《诗经》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。关于《诗经》的艺术价值,王西里认为《诗经》不仅为诗歌树立了创作规范,也为戏曲和小说奠定了语言基础。《诗经》的浪漫主义手法、简洁含蓄的用词成为后代作家学习的对象。更为重要的是,王西里还认为,中国古代各诸侯国拥有共同的祖先。他们从一个共同民族向四方迁居,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俗,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。因此,王西里认为《诗经》是中国远古时期存在统一民族的证据,它见证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。王西里的《诗经》研究只有19世纪实证主义的特点,他以中西对比的方式凸显了《诗经》的巨大价值,将《诗经》纳入了人类思想的宝库。王西里对《诗经》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对中华文明的认识。

尽管有了《诗经》的全译本,俄罗斯学者仍然对《诗经》的翻译精益求精。1896年,米哈伊勒、米勒尔等人又翻译了《诗经》中的五首诗,载于《中国和日本及其诗歌》一书中。

1892年,格奥尔基耶夫斯基(С. М.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, 1851—1893)出版了专著《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》。这是俄罗斯第一部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,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。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专攻中国先秦史,他在此书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大量地采撷《诗经》为史料。

1898年,贝勒(Э. В. Брегшнейдер, 1833—1901)出版了两卷本《西人在华植物发现史》,该书第二卷将《诗经》与《尔雅》、《尚书》和《礼记》等典籍配合使用,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植物。

1914年,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出版《中国之笛》一书,其中也收录有《诗经》的若干篇章。到十月革命前夕,俄国已经拥有《诗经》译本15种,其中有的是选译本,有的是全译本。

十月革命后,有一大批学者不时发表《诗经》的单篇译文。在选编世界古代诗文选的时候,也不断有新的选译出现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,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和文化交往发展迅猛,从事译介的大都是文史专家和科学院院士。1957年,什图金(А. А. Штукин, 1904—1964)完成了《诗经》新的全译本,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什图金吸收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,翻译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就在这一年,为了向广大苏联读者普及《诗经》,还出版了什图金的《诗经》选译本。在研究专著方面,费德林(Н. Т. Федоренко, 1912—2000)于1958年出版了《〈诗经〉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》一书。

俄罗斯重视教育立国,俄国时代如此,前苏联如此,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依然如此。圣彼得堡大学汉学系1911年的教学计划表明,《诗经》为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专业必修课。苏联解体后,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,许多俄罗斯汉学系的学生,都把到中国工作定为自己毕业后的首选,《诗经》依然是他们的所爱。

### 三、法国的诗经学研究

法国的《诗经》研究起步较早,成果丰硕。尽管欧洲各国后来的《诗经》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但是从客观上说,法国的《诗经》研究为许多欧洲国家的同类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。早期研究所必备文本资源就是《诗经》的各国语言译本。由于欧洲各国语言大都相近,因而《诗经》的法文译本,以及作为背景资料的中国

古代典籍的法文译本,为欧洲各国的同行提供了莫大的便利。

17 世纪的法国《诗经》研究以拉丁文本《诗经》的翻译为代表。1610 年,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(Nicolas Trigault, 1577—1628)来华,经过十数载努力,他成功地将“五经”翻译为拉丁文,并于 1626 年在杭州刊印。这是中国典籍最早的西文译本。《诗经》为“五经”之首,俨然存于其中。

18 世纪的法国《诗经》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。法国传教士刘应(Claude de Visdelou, 1656—1727)得到清朝皇帝康熙的关怀,研究过《诗经》等中国典籍。法国传教士马若瑟(Joseph de Prémare, 1666—1735)曾选译过《诗经》的部分作品,其译作被法国人杜赫德(Jean-Baptiste du Halde)收入法文版《中华帝国全志》第二卷。18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《诗经》研究家是宋君荣(Antoine Gaubit, 1689—1750)。宋君荣在北京生活了 37 年,谙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各种名物制度。1749 年,宋君荣完成了《诗经》的法文译本,随即寄回法国。由于宋君荣的目的是用《诗经》的篇章来改善基督教的圣诗创作,故而其《诗经》的法文译本一直珍藏在教堂内,未公开出版。在信教的人士看来,这也是《诗经》的一种积极的运用。法国耶稣会士孙璋(Alexander de la Chame, 1695—1767)不仅翻译而且也研究《诗经》。他于 1733 年开始重新将《诗经》翻译为拉丁文。他还写了大量的注释,篇幅占到全书的 1/3。孙璋的译本名《孔夫子的诗经》,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于 1830 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在全欧洲广泛流传的《诗经》拉丁文全译本。法国汉学家尤里乌斯·摩尔(Julius Mohl)为此译本写了序言,该序言本身也是一篇研究性的论文。

19 世纪法国《诗经》研究的最大成就是完成了法文本的《诗经》翻译工程。著名的法译本如下。1872 年,鲍吉耶(M. G. Pau-

thier, 1801—1873)出版了法文全译本《诗经》，书名为《诗经：作为正典的中国古代诗集》，此书直接译自汉语原文，并含《诗大序》。这是《诗大序》第一次译为欧洲语言。顾赛芬(S. J. Couvreur, 1839—1939)是一位长期在中国直隶河间府(今河北献县)生活的法国神甫，他完成了影响更大的《诗经》(CHEU KING)法文译本。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清人邹圣脉所撰《诗经备旨》。邹圣脉活跃于1760—1796年间，即乾隆、嘉庆之际。该书有三种本子，一是《新增诗经补注》八卷，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序善成堂刊本所付《诗经备旨》。一是《武经备旨》本《诗经备旨》八卷。一是《御案诗经备旨》九卷，麟书阁印书局出版，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。《诗经备旨》的最大特点是十分注重发掘《诗经》所隐含的宗教神学意义。顾赛芬所译《诗经》由三部分构成：《诗经》的原文、朱熹的解释以及邹圣脉所做的各项工作。邹圣脉的工作包括对《诗经》各种基本知识的讲解、篇首提要、逐字逐句的解释、全文串讲。这是一个中文(包括汉字和法文式的注音)、法文译文和拉丁文译文三个语种相互对照的本子，其中拉丁文译本采用散文体，严格从意思上去把握。顾赛芬的译本同时也是研究著作。他用法、汉双语为译本写了大量的注释。这是因为拉丁文的句子，每个单词的语法关系是通过词尾的屈折变化来表示的，句子中单词的语序可以随意排列。这样一来，就可将拉丁文单词与汉语逐词对应，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文的原意。由于法文本的丰富，法国的《诗经》研究也加快了步伐。

20世纪法国《诗经》研究不仅有较多的论文，也出现了专著。20世纪法国《诗经》研究与当时兴盛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，即摒弃理论空谈，讲求实证。葛兰言(Marcel Granet, 1884—1940)是法国著名的《诗经》研究家，他出版了专著《中国古

代歌谣与节日》(*Fites et Chansons ancienne de la Chine*, 1919)。书中有他自己选译的《国风》诗篇 68 首。他以这些作品为解剖的对象,分成“乡村主题”、“村民之爱”和“山川之歌”三个部类,从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做了精彩的分析。他论证了《国风》诸篇与中国古代节庆、歌舞、求爱和劳动生活的联系,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风貌。他汲取中国传统传注的某些合理解释,复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歌、印度支那半岛各民族民歌与《国风》进行三元比较研究,进而探讨了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结构、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。该书还于 1932 年在伦敦、纽约同时出版了英文版,从而其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它具有文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神话学等综合研究的性质,开启了《诗经》研究的文化文类学维度。二战以后,西方《诗经》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,但是法国学者仍然有突出的建树。1962 年,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(Paul Demiéville, 1894—1979)主持编译的《中国古诗选》(*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 classique*)出版,其中选有上至《诗经》下至清诗的作品 374 首。此书出版之后,法国学者对《诗经》为首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又渐趋活跃了。

#### 四、加拿大的诗经学研究

加拿大属于英联邦国家,由于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联系,加拿大的《诗经》研究具有英国学术界的严谨风格。加拿大与美国毗邻,美加两国均系北美诸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,文化经济联系紧密,人员往来便利,因而加拿大的《诗经》研究又具有美国学术界的生动活泼与求新精神。

二战以来,由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,《诗经》研究中心转

移北美,《诗经》学术研究继续深化。加拿大的汉学家的研究一向侧重于语言研究、艺术研究,近年又重视历史文化研究。

诺斯罗普·弗莱(Northrop Frye, 1912—1991)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学者,也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世界大师级思想家和理论家。弗莱所开创的神话—原型理论,在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双向阐释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由于思维方式内在的一致性,弗莱一直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欢迎。北京大学曾经邀请弗莱讲学,可惜因为他健康不佳而未能成行。弗莱所倡导的原型意象批评已经催生出中外《诗经》研究家的大批著作和论文。目前,文学人类学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得到承认,沿着这一方向已经出现了不少皇皇巨著。然而,就弗莱的神话—原型批评理论本身而论,它也是受到《诗经》滋养而产生出来的现代理论。弗莱除了精通《圣经》所蕴涵的神话体系,也熟悉中国典籍诸如《淮南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诗经》,以及一部分道教文献。弗莱做学问的基本方法,就是把许多问题追寻到遥远的古代。在这一点上,弗莱与孔夫子信而好古的治学态度是一致的。在《诗经》的创作中,借景抒情、以景物的触感为契机而进行联想是一种最基本的写作手法。联想简单一些的称为比,联想复杂一些的称为兴。这样的创作手法在本质上与神话—原型批评也是一致的。

加拿大教授多布森(W. A. C. H. Dobson, 中文名:杜百胜)长于古代汉语的研究,著有《上古汉语描写语法》、《今古汉语语法研究》、《古汉语虚词词典》等西方汉学名著。多布森著《孟子》涉及《诗经》。多布森的《诗经的语言》(*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Songs*, Toronto: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, 1968)是加拿大最有名的《诗经》研究专著。他还撰写了大量的《诗经》研究论文。通过对《诗经》字词和语法研究,多布森论证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创作年